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现代性焦虑 与 文化批判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衣俊卿 著

Karl Marx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现代性焦虑 与 文化批判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衣俊卿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 / 衣俊卿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7-81129-001-1

I. 现… II. 衣…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816 号

丛书策划 李小娟

责任编辑 付洪泉

封面设计 咸泽寿

责任校对 张志坚

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

XIANDAIXING JIAOLV YU WENHUA PIPAN

衣俊卿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26.625
字 数	370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29-001-1/B·1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衣俊卿，男，1958年生，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专家。曾出版《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等学术著作十余部、《日常生活》等译著两部，并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九十余篇。连续四届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先后六次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总 序

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因此而改变。回顾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两条大致清晰的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推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直受到世界思想界的关注和重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理论挑战和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回顾20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贯穿整个世纪的现象,并由此形成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面临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的受挫、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文化危机,一批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应运而生: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等人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为背景,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彼得洛维

2 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

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判流派,以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实践的学说具有任何其他理论都难以比拟的开放性和历史穿透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代表人物进入迟暮之年,特别是随着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相继逝世,人们原本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批判运动即将成为“告一段落”的历史。然而,历史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图景:不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施密特、沙夫、科拉科夫斯基、赫勒、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一直活跃到世纪之交,而且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批判现存社会,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提出了挑战。一些偏激的人士,如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这些变化,断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成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进程又一次坚定地展开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减弱,反而有增无减。从1995年到2004年,在巴黎举行了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纽约、伦敦、图宾根、加利福尼亚等地,也相继召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1999年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都名列榜首。世纪之交,不仅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样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依旧活跃,而且,德里达、杰姆逊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纷纷“走近马克思”,从不同方面阐释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作出的“不能没有马克思”和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影响力。

我一直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而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一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不断变化。然而,无论是其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分析,还是关于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其关于暴力革命、政党策略、欧洲革命、东方社会特征的分析,还是关于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无论是其关于唯物史观原理的阐释,还是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等方法论的探讨,在深层次上都服从于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关切: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体现哲学本性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奠基在人的实践内在地具有的不断超越、不断扬弃异化的批判本性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等在内的许多当代思想家所敬重,他的学说的价值绝不会为我们的时代所穷尽。

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的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正源自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我们看到,无论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主题、问题域、范式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异,无论它们在重新阐释和张扬马克思的思想时存在多少误读和偏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像马克思一样,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类的命运;它们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学说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境遇,探寻新的革命变革的思路,以深刻的方式切入20世纪人类生存的焦点问题,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野。

正因为如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实践意义和指向。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表面看,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在多维视野中对

4 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

于这些理论观点的评价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注热情更多地是这些理论的现实“所指”。我们是以折射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直接的理论反思。因此,当代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专业人士往往是通过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来深刻理解 20 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他们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而言,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而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一定是同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说来,在全球化背景中,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 20 世纪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擦肩而过。毫无疑问,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流派时,忽视它们的局限性、失误和理论错误,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倾向;然而,不去认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启示,

同样是不能容许的褊狭和封闭。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05年11月25日举行的第26次集体学习,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题,专门了解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西方国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流派”。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翻译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单独立,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理论热点。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此,在为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就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作了讲解之后,我一直考虑以某种方式来推进这种回顾和总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是几位中青年学者过去十几年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成果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当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范式、理论评价、推陈出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某些理论失误。正因如此,适时地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清醒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具有特别的意义,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同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

衣俊卿

2007年11月15日

序 言

迄今为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体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构成我的学术历程的中轴线。过去十几年间,我先后承担了有关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哲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表面看来,这些课题是在从事几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而实质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一直是我从事这些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源自于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人的文化底蕴已打上日益浓厚的大学的印迹。我在纪念中国恢复高考 30 年时的一篇随笔《曾经一九七七》中这样写道:“曾经七七、七八”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方式打上特有的底色,而“曾经北大”则构筑了我们人文精神的核心与圆点。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开放的文化批判精神,使我形成了对哲学的特有理解。

我曾这样描述我的哲学观。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澄明。因此,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和不变的定位,而是与

2 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

人的生存一同自觉地扩展和显现存在的意义。哲学总在途中,那是一条永远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具体说来,在人类文明史中一直与人类共存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体系或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和套用的公式及原理,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真正能够代表每一时代的哲学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反思、理性的批判、文化精神的生成和重建,表现为对原有的哲学体系和教条的不断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理性和哲学反思应当是最活跃的生命之流,它不断地批判人类业已生成的文化构造,不断捕捉、预见、引导新文化精神的生成,为人的存在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启蒙;不断地通过现实的文化批判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清醒的自我意识。

正是这样的哲学视野使我义无反顾地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也正是这样的哲学理解,使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的系列学术讲座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伏笔。1983年,时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助教的我以较高的分数通过了EPT考试(总分160分,我获得了132分),取得了国家教委公派进修访学的资格。按照这一分数,我可以选择去美国、英国等英语国家留学,然而,当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机遇。

1984—1986年间,我作为国家教委选送的进修生,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进修哲学。出于对实践哲学的关注,我选择了实践派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通过塞尔维亚语语言关之后,我有幸同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马尔科维奇(Mihajlo Marković)、弗兰尼茨基(Pledrag Vranicki)、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考拉奇(Veljko Korać)、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波什尼雅克(Branko Bošnjak)、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等十几位实践派哲学家结识,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特别是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šić)的精心指导下,我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二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并于1987年1月23日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我开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一方面,我把关于实践派的研究扩展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步开始对沙夫(Adam Schaff)、科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科西克(Karel Kosik)等人的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Agnes Heller)建立了通信联系,得到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并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另一方面,我开始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我先后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等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项目,出版了《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等学术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

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宗旨并不是简单地介绍这些流派,而是为了加深我们对20世纪历史进程的本质认识。应当看到,20世纪人类历史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涵,一方面,以科学技术进步为背景,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创造性、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也在普遍强化,人被自己的造物所困扰,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受着无形的异己力量的摆布。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在20世纪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等,从不同侧面所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对于人及其世界所作的这种文化批判,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历史和人类精神的基本走向,唤醒人类内在的批判意识,促使现代人反抗异化、超越物化,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存在层面跃升,这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机制和内涵,也是实践哲学的具体展开。因此,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刻理解20世纪的人类文化历史困境,把握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这也正是我近年来所从事的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4 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

我在选择编排本文集时主要突出文化批判这一主题,以期显现自己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关注和理论特色。本文集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编是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我把马克思学说在本质上理解为基于人之实践的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认为正是这种文化批判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穿越不同时代的当代性。可以断言,20 世纪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多变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场景中,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界定为马克思的传人,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源于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的固守。第二编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定位的总体把握。我认为,置身于文化焦虑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研究范式上实现了重要的“文化转向”,并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等现代文化批判的主题,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对由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做了独特的解答。第三编是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即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对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发达社会的技术异化的批判为基础,提出了以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为核心,以人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批判理论。其中既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也包括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第四编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我认为,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文化批判理论所环绕的焦点性问题是现代性的命运问题。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包含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但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而且,对于现代性的各种批判或修正都来自于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性和反思性,所谓“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它的自我完善。

衣俊卿

2007 年 11 月 5 日

目 录

总序 / 1

序言 / 1

第一编 马克思学说的文化批判精神

“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 3

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 16

人之存在与哲学本体论范式

——兼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意蕴 / 32

马克思思想: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 / 45

论马克思批判意识的内在结构与基点 / 58

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 / 69

哲学: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位 / 78

第二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 从总体上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 93
- 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格局 / 100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 / 112
- 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 / 128
-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 / 143
- 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
——20 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一种演进思路 / 158

第三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诉求

- “具体的总体”与辩证法
——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初探 / 173
- 人的需要及其革命
——布达佩斯学派“人类需要论”述评 / 182
- 论实践派的实践范畴 / 193
- 论实践派的异化观 / 205
- 论实践派的革命范畴 / 218
- 人的存在与辩证法
——论实践派的辩证法观 / 227
- 马克思主义分化与危机问题的新探索 / 238
-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革命理想(译文) / 248

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意味着什么(译文) / 260

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译文) / 275

第四编 文化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 291

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与中国的文化境遇 / 319

走近罗蒂

——关于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哲学的对话 / 332

东方与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中国语境下过程哲学和文化哲学的一次对话 / 341

在启蒙的地平线上

——关于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对话 / 347

破解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文化阻滞力

——记衣俊卿和他主编的《日常生活批判》丛书 / 372

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 385

论全球化时代哲学理念的更新 / 401

篇目索引 / 407

第一编

马克思学说的文化批判精神